

# 也谈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 “被俘” “被扣” 问题

朱 峰

1941年1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七千多名新四军战士惨遭屠杀。在这次事变中，新四军军长叶挺究竟是被俘还是被扣的，党史界历来有不同意见。但近年来“被扣”说似乎已经得到基本上的公认。然而，通过阅读一些材料，笔者却认为，叶挺在皖南事变中还是被俘的。

## (一)

先从我方的资料来看：

新四军军部保存的档案《皖南事变要报》中有有以下记载：“十四日，军长率教导队四个队及部分工作人员突围至大康王，当时大坑（康）王出口处，已为一〇八师堵击，以火力封锁我之出路。此时一〇八师派人来与我谈判，黄诚、李子芳亦于此时至一〇八师谈判被扣。延至下午四时，敌人又开始向我总攻，因我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致伤亡甚重。叶军长亦负伤被俘。（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以下同）。项、袁、周当即失踪。至是才全部停止战斗，我皖南部队除有少数突围外，全部被敌歼灭。”①

周恩来于1941年1月19日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相》一文中谈到叶挺的情况时也说：“而且在打伤了他的臂后，捉起来加以污辱，这更增加人们愤怒”②“陈毅在《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一文中更多次提到“叶军长负重伤被擒。”毛泽东说叶挺“力竭负伤，陷身囹圄。”③“被扣”论者所持“中央和南方局负责同志在公开场合对叶挺本人的遭遇从未直接用过‘被俘’的提法”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

曾经亲身经历皖南事变的一位青年回忆：叶挺看到自己的部下死伤殆尽，决定亲自劝说对方停火④。在皖南事变的整个过程中，谢忠良都在叶挺的身边。后来他在追忆叶挺下山的情景时说：东流山失守后，情况越来越严重。“有人向叶挺军长提出：还是隐蔽一下吧！叶军长说：我不去，抗日打鬼子难道还犯法？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这个王八旦算帐去。要隐蔽，你们去吧！这时，项英、周子昆悄悄地离开叶军长，到深山密林里隐蔽起来了。平时沉默寡言的叶军长，这时脸色显得比平常更严峻。他满面怒容，出人意料地往山下走去。我们也不敢过问。就这样，叶挺军长也下了山。叶军长下山以后，军部呈现群龙无首的状态。”

⑤这则史料基本上讲清了叶挺下山谈判的背景。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叶挺下山后是马上被敌人捕去呢？还是被敌人诱骗到敌指挥所才失去自由的？如系前者，则谓被俘；如系后

者，则是被无理扣押。请看以下的资料：

泰国华侨青年、曾任叶挺机要秘书的陈子谷于1980年8月15日回忆：“十三日夜，我军分路突围。十四日下午，我与二支队宣传干部路垣同志，在一处乱山荒草之间被捕。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当时任代书记政委的饶漱石，见大势已去，就指示叶军长下山与敌人谈判，希望以此来挽救部分革命干部。但在叶军长和他的随从人员，还没有下山的时候，敌人的部队就已经包围上来，并把他们俘虏了。当时来抢叶军长的有国民党的直系52师，有东北军108师，还有川军144师。为了向蒋介石报功，他们之间几乎因此火并起来。”<sup>⑥</sup>陈子谷以上叙述虽然说是饶漱石指示叶挺下山去谈判，但该文却十分明白地告诉我们：叶挺来不及下山就被敌人的搜山队俘虏了。

再看看国民党方面的材料：

参加围攻皖南新四军的国民党52师事变后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上报材料中说：“52师156团第二营第四连十四日十六时搜剿鹿角山以西山冲中，将叶挺俘获。”<sup>⑦</sup>该文与新四军档案资料记录的“下午四时”是一致的。皖南事变后，第三十二集团军给国民党所呈围击新四军战斗的详细报告也称：“本（十四）日申刻，我52师在鹿角山擒获匪军军长叶挺及要员多人。”<sup>⑧</sup>另外，顾祝同第三战区总司令部少将参谋处长岳星明解放后写文章也是认为：“由于顾祝同紧扣弹药不发，粮食也不补给，新四军抗击近八倍于己的反动部队，时间达一周之久，终因弹尽粮绝，叶挺军长和所部战余的几千官兵落入虎口魔掌之中，战斗才告结束。”<sup>⑨</sup>

1962年，原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参谋处长武之葵在《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一文中，详细地介绍了叶挺被俘以及被转移的情况。文中说：“约在十四日，叶挺将军及随员七人在鹿角山西侧山坡下被俘。先至五十二师师部（三一三团临时归五十二师指挥）休息一夜，然后转送总部。”<sup>⑩</sup>武之葵还记叙了以下内容：十四日，上官云相指示：将叶挺及随员速送本部告知廉夫（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沿途优予招待。十八日，叶挺及随员共八人被送至上官云相总部，住在招待所，周围有卫兵监视，表面上很客气，在院内听任自由活动。当日下午，上官云相与叶挺谈话半小时。第二天，上官云相派一个少校副官张某带特务营一个排长两班兵士，坐一辆卡车送叶挺一行前往上饶战区长官部。张副官事后还对武之葵说：途中遇日机轰炸，张与叶一同隐蔽于一棵树下，张还耽心叶挺会逃走。车到上饶长官部副官处院内，马上将八人分别关押。从上述国民党方面的材料看，叶挺是被俘的。

## （二）

持“被扣”意见的同志认为：叶挺是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意见，到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的。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被扣”论者为说明叶挺被扣，一般引用了六个回忆材料，大致可分为新四军和国民党当事人两大类。然而，在引用材料时，“被扣”论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偏颇：

第一，同一个人有几种说法，而取其一，又没有讲出为什么，这令人费解。例如，与叶挺同时被俘的叶钦和在《回忆叶挺》一文中，只有一处提到叶挺是被扣的。但是，叶钦和在同一本书的同一篇文章中却说：“皖南事变你是那样勇敢无畏，为伤员亲自倒茶端水；特

别是回忆起我随你被俘后对我说：‘你们是受过党和新四军的多年教育，要临危不屈，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言犹在耳，永无会期，能不悲痛。”<sup>⑩</sup>同文还讲：“1941年1月中旬，我们十多个人，跟随叶挺被一〇八师搜山队捕后，随即押解到52师前方师部”。这与陈子谷的回忆内容是相吻合的。叶钦和不仅在《回忆叶挺》这本书中谈到叶挺被俘，还在《皖南事变回忆录》中回忆：“我强忍着悲痛，离开了任光同志（著名音乐家，《渔光曲》作者）。以后战斗安全失败了，我随军长和十余位同志下山被俘。”<sup>⑪</sup>所以，“被扣”论者单方面引用叶钦和的一个说法是片面的、不准确的。

第二，持“被扣”意见的同志引用了许多材料，但没有引用过叶挺本人的谈话。事实上，叶挺在失去自由后，自己也曾经亲口说过“被俘”。1941年1月14日，国民党52师副师长对叶挺说：“请叶军长下令，叫在山上的所有新四军官兵下山。”叶挺气愤地说：“我已被俘，再不是新四军军长了，我无权下令叫他们下山。要我出卖他们，我叶挺办不到。”<sup>⑫</sup>新四军军部参谋叶超回忆：“十四日，叶超与王守智和刘述辉（作战科见习参谋）突围出去了，他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后来听说叶挺军长就被俘了。”<sup>⑬</sup>

第三，所引材料不能说明问题。有同志撰文称：“真相大白以后，中央以及一些负责同志明确指出：是国民党方面‘强行扣留叶挺的’”<sup>⑭</sup>。其中一则关键的材料是，1944年8月28日，陈毅给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信中所附《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文，文中叙述说：“一月七、八、九日，曾将国民党军队击退。但到了十日以后，由于没有粮食，全军四日未沾水米，已呈险状。叶军长当时致书国民党前敌指挥官上官云相（由于他俩幼年同学于保定军官学校），责其违信背义，望其以抗敌为重，不宜自相残杀，应该让新四军继续通行。如允许，则叶本人可亲往上官总部协议，以解纠纷。上官得信之后，即回信同意，欢迎叶军长前往面商。叶军长为了抗战大局，奋勇前往上官处。”引文至此，作者忽然用删节号将以下一句话省掉，不知用意何在：“同行有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政治部秘书黄诚，并一部官佐和卫队排。”陈毅信的末尾是：“不料叶军长十三日到上官处，上官一面背约扣留叶军长及其随从，一面令大军猛攻，遂于一月十四日夜，完全歼灭了被围的新四军部队。”<sup>⑮</sup>

在了解以上有关叶挺被俘的材料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指出，陈毅在这里叙析的事件发生的过程不是很准确的。首先，新四军敌工部长林植夫和政治部秘书黄诚是在叶挺等人下山之前，单独赴敌谈判被扣留的，信中却将二者合并一起。其次，叶挺军长一行下山谈判的时间不是十三日，而是在十四日下午。最后，根据目前占有的材料来看，上官云相复信同意叶挺前去谈判之事值得怀疑。国民党反动当局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决心早定。战斗发生后，上官云相曾转下蒋介石手令：“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五万元。”<sup>⑯</sup>在军事进展十分得手的情况下，上官云相是不会同意谈判的。因此，用陈毅给包瑞德的信件来证明叶挺谈判被扣，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 （三）

无论是被俘还是被扣，都涉及到叶挺去谈判的问题。正确分析与敌人谈判这个历史事实，对进一步探求“被扣”论者的本意很有必要。

大家知道，自从项英和周子昆在十日晚私自离队后，党中央即电令当时东南局副书记饶

漱石负责新四军党的工作。叶挺十四日下山谈判，到底由谁最先提出来，一般认为是饶漱石提出来，并强劝叶挺服从党的命令。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

1941年5月18日，华中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皖南事变。刘少奇作了正报告，饶漱石作的副报告是这样说的：十三号，我们到了大康（坑）王的小岭里面，下午三点钟“敌人又向我们进攻，牺牲了很多同志。我跑到山上，又找到了军长。那时我和军长都这样想，假如这样搞下去，我们的干部一个也出不去，那中央对于这件事和种种情形都不会知道。因此我就同军长商量这个问题……。我们商量提出几个条件去交涉。这条件是三个：一，要立即停止进攻，让我们一条出路由皖南北渡；二，要释放一切我们被捕人员，交还枪支；三，一切问题都到……（以下的话记录人员未听清没有记下来——抄者注）。谈了以后，他（指叶挺）说，你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出去，马上跟他（指上官云相）谈，结果告诉你。我说那好，你出去，（我）详详细细告诉中央了。那我就送他了，从山上送到那个路口，走了十几分钟的路，我们招了招手，所谓生死离别。”<sup>⑧</sup>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饶漱石本人是不承认谈判由自己最先提出来的，讲述中有叶挺最先提出谈判的意思。

说叶挺首先提出谈判的材料还有：钱俊瑞于1941年2月20日写的《皖南事变记》其中有一则小标题是：《叶军长自动到一〇八师去接洽》<sup>⑨</sup>。谢忠良在《皖南事变回忆录》中也讲是叶挺主动下山谈判的。

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叶挺下山与敌人谈判是叶、饶二人共同商量并取得一致意见的结果。至于谈判最先由谁提出来，只有叶挺和饶漱石两人才知道。由于叶挺关于谈判由谁提出的史料至今尚未发现，因而饶漱石的副报告成为唯一的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其实，争论谈判由叶挺还是饶漱石最先提出来这个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认定谈判是由饶漱石首先提出的同志，似乎有这样一些用意：一方面可以推出叶挺谈判时被“无理扣留”，另一方面对谈判本身也是一种否定。然而，笔者却认为，与敌人谈判的主张无论由谁提出来，都是无可厚非的。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sup>⑩</sup>就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说，谈判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决策：第一，从我们方面看，谈判停战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叶挺是名震中外的北伐名将，并且与上官云相是同学；一〇八师在抗日战争期间，与新四军合作得也不错，由叶挺出面谈判，有可能促成停战。这对于挽救已奋战八昼夜、缺粮少水、弹尽援绝的新四军战士是当务之急。第二，相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谈判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致电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该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还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sup>⑪</sup>第三，不能因为谈判没有成为事实，就否定谈判本身。在革命斗争的危急关头，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该努力争取。叶挺下山企图与国民党军队谈判，这是伟大的壮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精神。

总而言之，说叶挺在皖南事变中到国民党军队司令部谈判时被扣留是不准确的。事实真相应该是：叶挺看到越来越多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倒下去，为了挽救危局，主动下山与国民党一〇八谈判停战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下山，就被敌人的搜山队俘虏了。对历史人物，无论伟大，还是渺小，研究者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去分析。叶挺是我们崇敬的烈

士，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他的光辉形象。这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sup>②</sup>饶漱石在建国后犯有重大错误，但叶挺下山谈判的事，并不一定是他首先提出的。

### 注释：

-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国防大学编，第540页。
- ②⑦⑩⑫《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央档案馆编，第324、272、162、136页。
-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9页。
- ④转引自冯文纲《叶挺被俘真相》，载《今昔谈》1981年3期。
- ⑤⑫《皖南事变回忆录》，上海、安徽人民出版社，第58、244页。
- ⑥⑪⑬⑭《回忆叶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8、72、74页。
- ⑧《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
- ⑨《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10页。
- ⑩⑰《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第29、42页。
- ⑮参见《瞭望》1983年9期。
- ⑱转引自郑健英《叶挺在皖南事变中是被俘还是被扣》，载《瞭望》1983年9期，第20页。
- ⑲《中共党史资料》1984年11辑，第184页。
- ⑳《列宁选集》二卷，第512页。
- ㉑《列宁选集》一卷，第26页。

### 读书杂识

## 《醉翁亭记》主旨一解

大明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贬为滁州太守。滁州地僻而事简，欧阳修亦为政宽简而不扰，故民便之（参《宋史》本传）。欧阳修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二文述其事。二文乃姊妹篇，后一篇尤为世人传诵。人谓《醉翁亭记》主旨，或曰表现了士大夫娱情山水、悠闲自适的情调，或曰表达了被贬官后寄情山水的特殊心理。今案此皆似是而非也。请解之曰：《醉翁亭记》述山林佳景之乐、滁人出游之乐、众宾酣宴之乐、禽鸟归栖之乐，又云：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何为“太守之乐其乐也”？此“乐其乐”乃与民同乐，又自得其乐之意，此《醉翁亭记》主旨之所在。《孟子·梁惠王下》有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醉翁亭记》“乐其乐”一语，正从《孟子》而来。其语主受有异（《孟子》言君王乐民之乐，则百姓亦以其乐为乐；《醉翁亭记》言太守以民之乐为乐），但旨意是一致的。欧阳公言滁人随其出游而乐，太守故以民之乐为乐；太守醉，亦能与民同乐，所以也自得其乐了。或谓“乐其乐”仅言“自乐其乐”，则不可解何以醉“能同其乐”之意。在《丰乐亭记》中，欧阳修言宋兴近百年来休养生息，而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这就将此一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